

1946 年：德国人的控诉

吴福钢

(Wolfgang Matthias Schwiedrzik)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对纳粹德国的战犯进行了纽伦堡审判，但这一审判遭遇了“胜利者司法”与战后德国人无力单独清算纳粹战犯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约翰内斯·韦尔等人于 1946 年 1 月在德国西南边境的康斯坦茨创办了《南方信使报》，并策划了《德国人的控诉》等系列文章，目的是强调不能仅限于将纳粹战犯交由纽伦堡法庭审判，而应对德国人自己的战争罪行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净化”。这份报纸和这一系列文章虽曾获得法国在当地占领军的基层军官乔治·费伯的支持，却在“去纳粹化”以及报社领导权的问题上受到当地左翼组织“反法西斯阵线”的攻击，并引起法国占领区高层的注意，最终以《德国人的控诉》为起始的“自我净化”行动未能持续下去。

关键词 纽伦堡审判 《南方信使报》 自我净化 《德国人的控诉》

我们获得了解放，却没有获得自由。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945 年 11 月 20 日，第三帝国战败半年之后，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对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及其他 22 名希特勒政权的代表人物提起了诉讼。被告人首先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即他们参与了侵略战争的策划、准备和实施；第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第三，被起诉犯有反人道罪，即参与了对被占领国家平民的谋杀、灭绝、掠夺和奴役，并出于政治、种族和宗教原因对人施加迫害。超过 400 场公开庭审采集了证人证言，展示了证物，询问了被告，从而得出一幅相当清晰而多样的图景。它揭示了纳粹政权犯下的惊人罪行与被告人所应共同承担的罪责。

对纽伦堡审判的评价一般说来很高，因为人们把它看作司法史上的巨大进步。它把人的尊严重新置于司法判决的中心，并强调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国家与社会意志的忠实执行者不能借用国家或者其他名义将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抽象化，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和荣誉为此付出代价。如此才能保证权利与道德准则不被无视。法庭将侵略战争视为犯罪，强调国际社会有权抵抗侵略成性的专制政权威胁世界和平的行为，并将战犯送上国际法庭。

德国民众对纽伦堡审判的反应是冷淡甚至抗拒的。尽管获得准许的媒体对庭审的开启进行了

广泛报道,但有关审判进展的报道在随后几个月明显减少。法庭虽然通过举证揭露了惊人的事实——有步骤地计划侵略其他国家,在占领区实行恐怖统治甚至大屠杀;但是,民众对此不仅没有感到震惊,而且对被告无一例外地否认针对自己的指控,也没有感到恼怒。民众保持冷漠,进而抗拒,因为这一审判是属于胜利者的。每个胜利者都有权这样做!人们又能怎样呢?阻碍法官办案是不可能的,对这种形式的“胜利者司法”表示赞同好像也不恰当。

在纳粹政权挑起战争七年之后,德国人在城市的废墟中过着艰难的生活。自欺欺人的纳粹统治崩塌了,陌生的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上百万人无家可归或者被赶出家乡,德意志人的国家不复存在,有约束力的司法体系不复存在,德国在政治舞台上没有自己的权利代表,人们只有依靠自己来应对生存的直接问题。至于那些站在纽伦堡这个外来法庭上的纳粹高官和将军,谁还会对他们的命运感兴趣呢?

纽伦堡审判的两难困境

参与纽伦堡审判的法官和律师十分清楚纽伦堡审判的两难境地。坐在这个法庭上的不是独立的法官,而是凌驾于战败国之上的战胜国代表。这里适用的法律(例如侵略战争的问题)是在事实酿成后才创造出来的,而且只有希特勒政权的代表被推上了这个国际法庭,德国从前的一系列对手中没有任何一个战犯受到法庭的审理。

“控方在判决德国人针对他国与本国人民实施的行为时使用了严厉的尺度”,美国主要控告人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法官在1946年10月表示“这一尺度在未来会被用来判决国家的行为。没有哪个民族可以背离这个标准,从而逃脱文明世界的审判与唾弃。”^①

纽伦堡审判的两难境地并非源于战胜国的专横,而是源于这样的事实:德国人没有做到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希特勒政权,抵抗力量太过虚弱。1944年7月20日,人们最后一次绝望地试图通过行刺来消灭独裁者,却仍然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从外部解放德国已别无选择。理卡达·胡赫^②(Ricarda Huch)在1946年2月致赫尔曼·黑塞^③(Hermann Hesse)的信中写道“我们自己的胜利令我们感到恐惧,因此我们在战争中十分痛苦地期望敌人获胜,我们渴望自身的沉沦,因为这同时意味着希特勒及其政权的沉沦。难怪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德国的罪过承担政治责任。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德国的罪责有彻底的认识吗?”

必要的外部解放随后到来,却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纳粹政权被消灭之后,坐在法庭上审判纳粹罪犯的不是德国人,而是战胜国代表。这意味着法庭使用的不是德国法律,而是国际法。因此,被告人对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从而尽量减轻指控带给他们的巨大压力。

那些同希特勒政权积极抗争的人感受到了这种情况的不足。由德国人自己来清算这些酿成德国灾难的主要责任人,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对这些战犯与法律玷污者进行审判和惩罚,本来就是反对希特勒的抵抗运动纲领中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历经这些年的集权统治、法制缺失与猖狂侵略之后,法律必须重新成为社会生活及德国与各国共处的基石,法治国家必须得到重建,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把这些长年来以德国的名义亵渎法律的罪犯推上法庭并予以宣判。^④

^① 转引自 Herbert Kraus (Hg.), *Das Urteil von Nürnberg 1946*, München 1961, 8-9.

^② Ricarda Huch (1864—1947), 女, 德国历史学家与文学家。

^③ Hermann Hesse (1877—1962), 德国著名文学家。

^④ 参见 die Kreisauer Dokumente: Bestrafung von Rechtsschändern, Deutsche Beteiligung an der Bestrafung für Schandtaten, Instruktion für Verhandlungen über die Bestrafung von Rechtsschändern durch die Völkergemeinschaft, in: Roman Bleistein (Hg.) *Dossier Kreisauer Kreis. Dokumente aus dem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7, 302-314.

但是,就算盟军允许德国人设立自己的法庭来审判纳粹罪犯,情况也不会有大的改观。抵抗运动的力量太虚弱了,他们在同流合污者构成的汪洋大海中只是少数,以致于他们只能依靠占领军政权的支持才能履行职责。具体设想一下,如果他们被指控为通敌卖国怎么办?或者再简单一点,如果他们被指责为帮凶,即另一种形式的“胜利者司法”怎么办?纽伦堡审判所蕴含的两难困境是无法消除的。

德国人的控诉

尽管面临如此困境,在纽伦堡审判开启六周之后的1946年1月4日,《南方信使报》就刊登了题为《德国人的控诉》的呼吁文章。^①《南方信使报》是一份德国日报,创办于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位于德国西南边境),在刊登文章几天前刚刚获得出版许可。

“作为纽伦堡审判的补充,在盟军的指控之外,本文希望揭示:为了过去的时代,我们德国人自己还应当进行哪些控诉,当然其中一大部分也要控诉我们自己”,《德国人的控诉》在导论中如此写道。围绕德国人对审判的态度,该文指出“纽伦堡审判的国际属性将我们德国人置于旁观者与旁听者的位置上。我们在那里所要做的只是了解真相,因为迄今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仅仅是知道被歪曲的事实或者干脆就是被蒙蔽了。我们在纽伦堡因为众多原因不能成为控方,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听候审判的罪犯不是针对德国和德国人实施了犯罪。纽伦堡其实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的机会,让我们知道国家社会主义是如何并在何种程度上把德国人滥用作犯罪的工具。因此,我们在关注审判的进行时感到一种灼热的羞耻感。这种感觉随着审判进展所带来的认识增长变得愈发强烈。事实越明晰我们就越清楚地知道,第三帝国不仅仅对世界负有罪责,对它自己的人民同样负有罪责。不过,这些罪行发生在另一个层面,因而要在另一层意义上得到理解与评价。”德国人民必须对这样的罪行有自己的判断,这不应依赖纽伦堡审判预先作出的判决,而是要独立地评价过去12年间国家社会主义统治对德国人民所犯下罪行的本质属性。

这篇《德国人的控诉》由《南方信使报》发行人约翰内斯·韦尔(Johannes Weyl)策划,报社总编辑弗里茨·哈岑多夫(Fritz Harzendorf)博士^②起草,构成了一系列文章的序曲。其中,发挥表率作用的全都是战后新时期的领导人,他们通过这些文章对纳粹政权的罪行展开了讨论,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在不可能设立德国法庭来审判纳粹政权罪行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媒体形式的法庭。

韦尔在1926—1944年间担任柏林乌尔施泰因(Ullstein)出版社的编辑与发行人,之后成为杂志部门的副主管,由于战乱流落到康斯坦茨。韦尔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学会了在不做有损名誉的事情同时求得生存,而且从不炫耀。这一点也体现在他战后创办《南方信使报》的过程中,尤其体现在《德国人的控诉》一文当中。应他的请求参与撰稿的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③和罗曼诺·古瓦尔蒂尼(Romano Guardini)、理卡达·胡赫、前帝国(指魏玛共和国时期)司法部长古斯塔夫·

^① Deutsche Anklage, in: *Südkurier, Tagblatt für Bodensee, Schwarzwald und das obere Donaugebiet*, 2. Jg., Nr. 1, Konstanz 4. Januar 1946, 1.

^② Dr. Fritz Harzendorf (1889—1964), 记者,1913年供职于《新康斯坦茨晚报》(*Neue Konstanzer Abendzeitung*),之后在卡尔斯鲁厄担任巴登州民主党秘书长,1919—1929年间在霍恩特维尔山边的辛根市(Singen/Hohentwiel)为《高地人报》(*Oberländer Zeitung*)工作,1929年出任《霍亨斯陶芬报》(*Der Hohenstaufen*)的总编辑,1940年成为预备役军官,1945—1946年担任《南方信使报》(*Südkurier*)总编辑,之后成为《萨尔布吕肯报》(*Saarbrücker Zeitung*)的总编辑。参见 Fritz Harzendorf, *So ein Journalist-im Wandel der Zeit 1913—1963*, Saarbrücken 1964.

^③ 参见 Johannes Weyl 及南方出版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同 Karl Jaspers, Romano Guardini, Ricarda Huch, Gustav Radbruch, Theodor Heuß, Eduard Spranger 等人的往来信件(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Marbach, NL Jaspers; Bundesarchiv Koblenz, NL Spranger; Archiv Dr. Brigitte Weyl, Konstanz)。

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巴登—符腾堡州前文化部长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ß)以及教育学家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他还与女作家格特鲁德·博伊默(Gertrud Bäumer)、历史学家格哈特·里特尔(Gerhard Ritter)以及作家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有了接触。另外,他还邀请了一名士兵和一名工会领导人参与撰稿。^①

自我净化

按照《德国人的控诉》,德国民众不能够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把战犯交由国际法庭来审判并实施惩罚。“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德国人自身。这种自我净化只能是我们对既往罪行认识的结果。德国人的控诉旨在对这一认识进行客观探究,从而使其成为德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因此,我们下定决心提起控诉”。

“自我净化”这一概念代表着所有参与者的态度。“净化”或“自我净化”在所有撰稿人这些年发表的文章中都出现过,对于在抵抗运动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或是至少与抵抗运动相关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才是核心概念。它概括了德国人在希特勒政权酿成灾难之后应当完成的主要任务。《德国人的控诉》也是这样认为的。“净化是我们的政治自由的前提”,雅斯贝尔斯于1945—1946年冬季学期在海德堡大学有关“罪责问题”的著名授课中讲道“因为只有对罪责有所认知才能产生团结与责任意识,否则自由就是不可能的。”^②战胜国为了实现对德国人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再教育”的目标,以不同形式推广各种“再教育”的理念。对此,雅斯贝尔斯一概反对。他在同一时期对挪威作家西格丽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的答复中强调,只有通过内心悔过与“自我净化”才能从本质上改变德国的状况。^③这位作家在一篇诋毁文章中宣称,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是没有希望的。^④对一个民族从外部进行“再教育”的确是不可能的,雅斯贝尔斯解释道“如果强行灌输既定价值观与知识就无法实现再教育”,“只有通过自我教育才能发生转变。我们迫切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教育对我们的灵魂进行净化与重塑。”^⑤

大约在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就“罪责问题”进行授课的同一时期,也就是1945—1946年之交,胡赫在耶拿(Jena)发表了一份新年评论。她的决绝与德国人的伤感自怜倾向形成了对比。“在过去这些年里,罪恶堆积如山,当下我们正在承受其后果。这使得我们倾向于用我们的苦难覆盖我们的罪过”胡赫写道“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罪责,必须正视其实际影响,就像一名旁观者所做的那样。”德国人让那些本不该得到信任的人掌握了政权。他们本应看到那些暴力行为,并为此感到胆寒。“如果我们说,一帮匪徒袭击了我们,蹂躏了我们,并强迫我们协同他们犯罪,人们一定会大笑:难道数百万人还不能抵御一伙匪徒吗?”^⑥

韦尔与哈岑多夫认为,审判那些把德国人民引向灾难的主要罪犯对于“自我净化”作用重大。

^① 参见 *Deutsche Anklage*, in: *Südkurier*, 2. Jg., Nr. 1, Konstanz 4. Januar 1946, 1.

^② Karl Jaspers, *Die Schuldfrage*, Heidelberg 1946, in: Renato de Rosa (Hg.), *Karl Jaspers, Erneuerung der Universität. Reden und Schriften 1945/46*, Heidelberg 1986, 211.

^③ Karl Jaspers, Antwort an Sigrid Undset, in: *Neue Zeitung*, München Oktober 1945, in: Karl Jaspers, *Lebensfragen der deutschen Politik*, München 1963, 115.

^④ Sigrid Undset, *Die Umerziehung der Deutschen*, Oktober 1945, in: Karl Jaspers, *Die Antwort an Sigrid Undset*, Konstanz 1947.

^⑤ Karl Jaspers, Antwort an Sigrid Undset, in: *Neue Zeitung*, München Oktober 1945, in: Karl Jaspers, *Lebensfragen der deutschen Politik*, München 1963, 120.

^⑥ Ricarda Huch, *Neujahrsbetrachtung 1945/46*, in: Wolfgang M. Schwiedrzik (Hg.), Ricarda Huch, *In einem Gedenkbuch zu sammeln... Bilder deutscher Widerstandskämpfer*, Leipzig 1997, 242—243.

哈岑多夫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力统治在本质上破坏了宪法,而破坏宪法就是对主权的背叛。“英国人把查理一世、法国人把路易十六推上人民法庭并送上断头台,因为他们胆敢侵害本国人民的自由,如今这也成为德国人不可免除的义务,为了给民主制度建设创造前提,必须把叛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推上法庭并至少对他们进行道德控诉”,《德国人的控诉》如此写道“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例子带给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自我净化可以完成真正符合民主精神的革新。”韦尔与哈岑多夫都认为,在德国法律的基础上通过公开庭审对主要罪犯进行宣判是重要的前提,接下来的深化措施就是对国家和社会实行“去纳粹化”,用不同方式来处理罪责较轻者与同流合污者。

今天的人们在阅读文章时,会为这些发起人的决绝与清醒感到惊讶。他们在战后新时期刚开始时就尝试对纳粹政权进行清算,并在“去纳粹化”的问题上表现出特别强的辨别性。他们为了德国人的罪责,为了“自我净化”与民主的新起点发表了《德国人的控诉》。

韦尔与哈岑多夫策划的《德国人的控诉》却失败了。在第一篇文章(后续文章本应继续发表)刊登四周之后,韦尔被法国占领当局解除了《南方信使报》的发行人职务,以哈岑多夫为中心的编辑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南方信使报》得以存续,但是发行人委员会与编辑部都被重组,由各政党(共产党、社民党、巴登基督教社会人民党以及后来加入的自由党)的代表接手。

“我同您一道为《南方信使报》的变质感到痛心。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症状”,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3月13日致韦尔的信中写道“看来我们无法容忍一份像《时代》这样的刊物存在,有着自己的精神传统,不依靠任何党派,自负责任,积极支持政府,但是要通过批评的方式。”^①各党派代表却没有把《德国人的控诉》企划继续下去。已经写成的文章最初没能印发,后来在不同的地方得以发表。这些文章同《德国人的控诉》之间的联系不再为人所知。

法国的占领政策

《德国人的控诉》是因为占领政权的专横才终止了吗?这是否印证了法国占领政策的严苛与不宽容?对于法国人而言,1946年初德国方面的这一独立创举真的就无法容忍了吗?

1970年《南方信使报》创办25周年之际,韦尔就报纸的初创接受采访时说“因为当时我很有兴趣办一份自由的德国报纸,于是就有了《南方信使报》。当时我是一名返乡士兵,来到康斯坦茨纯属意外。”^②在他的领导下,《南方信使报》在此期间已经成为整个博登湖地区颇具影响的报纸。“在纳粹时期过后,能够创办一份自由的报纸带给我内心的愉悦是非同寻常的,当时那真是一种政治精神的享受。今天的报业人士很难体会到这种感受,因为他们已经对自由习以为常了”。在《南方信使报》创立五个月之后,他就被解除了发行人职务,他的编辑部也被解散,对此他只字未提。

与美国占领区或英国占领区的发展相比,德国西南地区的人们对法国占领时期总的来说抱有相对负面的印象。^③由于失败而倍感屈辱的法国常年处于德国占领之下,直到很晚才被纳入盟军

^① Karl Jaspers, Brief an Johannes Weyl vom 13. März 1946; 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Marbach (DLA), NL Jaspers, Sign. 75. 9588 und Archiv Dr. Brigitte Weyl, Konstanz.

^② Peter Stiegele, Interview mit Johannes Weyl, in: Zeitungsstart, SDR-Abendschau vom 17. September 1970, SWR: TV-Archiv, Stuttgart, Archivnummer 7011155 SDR.

^③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Hg.), Jürgen Klöckler, *Abendland-Alpenland-Alemannien. Frankreich und die Neugliederungsdiskussion in Südwestdeutschland 1945 - 1947. Studien zu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1998. 亦可参见 Stephan Schölzel, *Die Pressepolitik in der französischen Besatzungszone 1945 - 1949*, Mainz 1986; Claus Scharf, Hans-Jürgen Schröder (Hg.), *Die Deutschlandpolitik Frankreichs und die französische Zone 1945 - 1949*, Wiesbaden 1983; Manfred Bosch, *Der Neubeginn. Aus deutscher Nachkriegszeit, Südbaden 1945 - 1950*, Konstanz 1988; Frank Roy Willis, *The French in Germany 1945 - 1949*, Stanford 1962.

的圈子,却恰恰因此更为看重自己的战胜国地位。尤尔根·克吕克勒(Jürgen Klöckler)在他的书中提到了德国西南地区的占领与重新划分计划“当第一支法国军队借助美国的浮桥与船只跨越莱茵河时,他们对西方联盟的依赖便显露无遗。”“法国人的几乎全部装备都是美国制造,由租借法案出钱。”^①对于德国西南地区的居民来说,摧毁黑森林小城弗洛伊登施塔特(Freudenstadt)以及随后发生的劫掠、强奸与野蛮处决,不仅意味着德国人的抵抗是没有意义的,还显露了法国占领者的严酷与放纵。自1944年匆匆组建而成的法国部队不仅缺乏训练,也在相当程度上缺乏纪律。

就在康斯坦茨,法国将军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举行了好几次炫耀性的军事游行,旨在引起德国民众对法军的尊重。在康斯坦茨,滥用职权的现象也零星出现。1945年5月中旬,塔西尼将军因为几张法国招贴画被损坏做出了粗野的回应——他威胁要把整片城区烧成灰烬。这一举动并没能赢得当地居民对他们的解放者的好感。^②尽管如此,韦尔在康斯坦茨创办一份“自由的德国报纸”的计划还是遇到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康斯坦茨没有经历战斗就移交给了法国人,因此没有被摧毁。由于距离瑞士边境很近,再加上阿勒曼尼人的思维方式促成了跨越边境的团结,当法国人于1945年4月26日开进康斯坦茨之时,负责守城的德军残余逃入瑞士,并在那里被解除了武装。在战争的最后几日,一台用于印刷《博登湖评论》(国家社会主义媒体)的轮转印刷机本来被党卫军下令炸毁,却由于房屋管理员和几个印刷工人的勇气得以保全。法国军政府与地区占领机构建立过程中的混乱局面成了创办《南方信使报》的最有利条件。至少在最初的几个月之内,这种局面使得法国管理部门的最低层拥有高度决定权。^③

乔治·费伯与约翰内斯·韦尔

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在《南方信使报》的创立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他是乔治·费伯(Georges Ferber),负责媒体与文化的军官,1945年4月底跟随一支仅受过短期训练的杂牌军进驻康斯坦茨。韦尔自己在谈到与费伯的相遇时,总是称之为“一起特别幸运的事件”,并评价他是欧洲和解的先行者。“我试图与法国军政府取得联系,于是就在文化办公室找到了这位年轻的阿尔萨斯人费伯。他非常开明,我在有关报纸、政治、战后局势的问题上与他沟通得非常好”。^④

费伯当时将近30岁,1999年以84岁高龄在阿尔萨斯去世。他是康斯坦茨战后时期的见证人之一。“要知道,法国人直到很晚才在德国确保了一个占领区,那是1944年底。但是,占领区具体应该是什么样子,没人知道。无论如何,法国人还是开始筹建行政管理机关,然后就号召感兴趣的人来报名,前提条件是掌握一定程度的德语。于是,我就报名了。我对此感兴趣,我终于有机会直接了解德国了”。^⑤

费伯在1936年至1939年间担任阿尔萨斯一所高中的古典文学教师。他参加法军以反抗德国入侵,在1940年6月20日被俘。但是,他拒绝了为他开出的条件:只要接受德国国籍就立即释放他。他的祖父在1870年至1940年间几度被迫更换国籍:先是法国人,后来成为德国人,然后又成为法国人,

^①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Hg.) Jürgen Klöckler, *Abendland-Alpenland-Alemannen. Frankreich und die Neugliederungsdiskussion in Südwestdeutschland 1945-1947. Studien zu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1998, 27.

^② 参见 Lothar Burchardt, *Konstanz zwischen Kriegsende und Universitätsgründung*, Konstanz 1996.

^③ 参见 Jerome Vaillant(Hg.), *Französische Kultur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45-1949*, Konstanz 1984.

^④ Peter Stiegele, Interview mit Johannes Weyl, in: *Zeitungsstart, SDR-Abendschau vom 17. September 1970*, SWR: TV-Archiv, Stuttgart, Archivnummer 7011155 SDR.

^⑤ 1998年5月22日,吴福钢对费伯教授进行的采访。

接着又变回德国人。他想避免这种情况。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在被占领的法国得到释放,并在战争期间学习了日耳曼语言文学,因为他感到,自己同德国、德国文化是相连的。

1945年6月,当韦尔找到他申办报许可时,最初的几次对话就让费伯清楚地感到他们所见略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拥有一切权力,但是这个人说起话来就像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对我谈起创办报刊或者出版社的计划,都与我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韦尔起草了几份文书,为他在康斯坦茨创办一份“自由的德国报纸”的计划做了说明。^①他强调,战败及其全部后果是德国从国家社会主义之下获得解放所应付出的代价^②,对战后现实的无条件接受是取得有效后续进展的前提。

自力更生

韦尔和雅斯贝尔斯、胡赫及其他《德国人的控诉》计划参与者一样,欢迎盟军对德国的解放。他欢迎解放的理由是,当人体由于感染或某种疾病不能自愈时,就必须采取外科手术的治疗方法。但是,他知道,手术本身并不能达到治愈的效果,只有加强人体自身的力量,才能在手术完成后实现身体的自愈,这样手术方能算作成功。所以,韦尔把他发表在《南方信使报》上的第一篇社论命名为《自力更生》^③,他把“自力更生”作为纲领,从而与对德国人从外部进行“再教育”的理念含蓄地划清了界限。

费伯支持他的观点,认为这是他们要完成的任务。“我认为‘再教育’这个词完全是不恰当的。要想赋予德国人建设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尽可能多的自由。德国人在他们的国家本来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只是十年纳粹统治让人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有这个资本,就应该去利用。必须让他们重新调动起这些资源。他们应当提取自己的资本。这样才行得通。‘再教育’?不要!我从不认为必须要对人进行再教育。我们必须赋予他们可能性去自我净化,并重新找回自身的好传统。这就是‘自力更生’”。^④

在这个问题上,费伯与诸如施密特雷恩(Schmittlein)将军^⑤等驻巴登巴登的法国军政府上层官员是完全对立的,但这些冲突还没有公开暴露出来。费伯这样的基层人员仍然有比较大的决定空间。由于时局紧迫,占领政权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这与自上而下的法国传统并不相符。“盟军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非常骄傲自负,无论是在我们当中还是在美国人当中都有。我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我们想教会他们怎么做事,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是如此异样。我们并不比其他人更为公正。只是眼下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有一大堆可怕的历史需要反思。但是,既然到了战后,就该把这个任务移交给德国人。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按照我们的命令做事”。^⑥

^① Johannes Weyl, Zur Frage, in: *Konstanzer Zeitung*, Konstanz 11. Mai 1945; Johannes Weyl, Brief an den Landeskommissär Dr. Nordmann, Konstanz 1. Juli 1945; Archiv Dr. Brigitte Weyl.

^② Johannes Weyl, Bemerkungen zur deutschen Presse, Denkschrift für das Gouvernement Militaire de Constance, 22. August 1945, 2; Archiv Dr. Brigitte Weyl.

^③ Johannes Weyl, Aufbau von innen, in: *Südkurier*, 8. September 1945; 参见 Johannes Weyl, *Aus 50 Jahren Zeitungsarbeit*, Konstanz 1976, 15-21.

^④ 1998年5月22日,吴福钢对费伯教授进行的采访。

^⑤ 参见 Raymond Schmittlein, Die Um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Bericht vom 27. Januar 1948), in: Jerome Vaillant, *Französische Kultur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45-1949*, Konstanz 1984, 161-185.

^⑥ 1998年5月22日,吴福钢对费伯教授进行的采访。

《南方信使报》的遭遇

在与驻弗莱堡的上级机关磋商之后,费伯于 1945 年 8 月初授予韦尔办报许可。^① 韦尔在 8 月 20 日提交了一份组织架构计划,合伙人除韦尔之外还有飞艇建造者雨果·埃克纳(Hugo Eckener)博士^②,以及在康斯坦茨拥有一家科技学校的保罗·克里斯蒂亚尼(Paul Christiani)博士^③,稍后加入他们的还有前中央党^④政治家、后来的巴登农业部长卡尔·迪兹(Carl Diez)。^⑤

在很短的时间内,《南方信使报》就在康斯坦茨、博登湖地区以及黑森林南部成为最具影响力和最为普及的报纸,发行量在 1946 年初达到 18 万份。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发行量受限的原因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纸张不足。“那时候如果想要办报并不需要钱”,韦尔说“计划内容还没付印就马上卖光了。刊登广告的人是提前付款。读者也是提前付款。也就是说,除了经营许可之外,办报纸不需要任何运营成本。”^⑥

然而,韦尔的位置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主要攻击却不是来自“右翼”,即从前的中央党人士;而是来自“左翼”,即所谓的“反法西斯阵线”(Antifa)。

“反法西斯阵线”指的是在共产党和左翼的社民党领导下联合起来的当地以及整个地区的“反法西斯”力量,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康斯坦茨“抵抗联盟”)在第三帝国时期就组织了抵抗,另一部分的前身则是 1943 年至 1945 年间在瑞士活动的移民团体“自由德国”。^⑦ 最初他们使用了“自由德国”的名称,结果被法国人取缔了(估计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涉及全德国)。但是,在经过一系列演变之后(占领政权可能是容许的),自 1945 年 10 月或 11 月开始得以使用“新德国运动”的名义来合法地开展活动。

围绕“去纳粹化”的争端

《南方信使报》与“反法西斯阵线”之间冲突的焦点是“去纳粹化”问题。1945 年 9 月 28 日,总编辑哈岑多夫在题为《净化》的社论中谈到了纳粹统治期间追求公职与物质利益的人,指出这批人为数众多。他的观点是,“净化”措施必须首先针对政权的主要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与此同时要

^① 参见 Georges Ferber, *Der Neubeginn der Presse in Konstanz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 Jerome Vaillant, *Französische Kultur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45 – 1949*, Konstanz 1984, 71 – 106. 亦可参见 Sebastian Dix, *Südkurier 1945 – 1952. Bewegte Anfangsjahre einer Regionalzeitung*, Konstanz 1995.

^② Dr. Hugo Eckener (1868 – 1954) 参见 Rolf Italiander, *Ein Deutscher namens Eckener. Luftfahrtpionier und Friedenspolitiker. Vom Kaiserreich bis in die Bundesrepublik*, Konstanz 1981.

^③ Dr. Paul Christiani (1901 – 1974), 在康斯坦茨拥有名为 Dr. Ing. Paul Christiani 的科技学校与出版社。

^④ 德国中央党,成立于 1870 年,1933 年被迫解散,代表德国天主教,二战结束后重建,但已失去影响力。前中央党人士成为现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核心组成部分。

^⑤ Carl Diez (1877 – 1969) 农场主,1912—1933 年间担任帝国议会议员,1921 年在 Matthias Erzberger 遇刺事件中身负重伤,数次被纳粹“防范性拘留”。

^⑥ Peter Stiegele, Interview mit Johannes Weyl, in: *Zeitungsstart, SDR-Abendschau vom 17. September 1970*, SWR: TV-Archiv, Stuttgart, Archivnummer 7011155 SDR.

^⑦ 参见 Rudi Goguel, *Dokumente des Kampfes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um die Aktionseinheit-Sozialdemokraten und Kommunisten-im Bodenseegebiet in den ersten Jahren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 *Dokumentation der Zeit*, Heft 135 – 137, Berlin 1957; Karl Hans Bergmann, *Die Bewegung “Freies Deutschland” in der Schweiz 1943 – 1945*, München 1974; Sebastian Dix, *Südkurier 1945 – 1952. Bewegte Anfangsjahre einer Regionalzeitung*, Konstanz 1995, 57 – 73; Georges Ferber, *Der Neubeginn der Presse in Konstanz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 Jerome Vaillant, *Französische Kultur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45 – 1949*, Konstanz 1984, 100 – 106.

确保受害者获得赔偿。采取相应措施绝不仅仅是军政府的责任,这也是而且首先是德国人自己的事务。

难题就出在所谓的“人头党员”身上,这些人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己的信念,或者说他们仅仅是形式上的党员,很难做出定论,是否应解除他们的职务。“这种情况十分棘手,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因为这些人很有价值,他们的工作对于德国的未来不可或缺。因此在制定遴选官员与职员的标准时,既要考虑到党籍问题,又要考虑到人品的可靠性。综合考量才能判定,哪些人有资格参与建设德国的未来”。^①

这种辨别性很强的立场远远超越了时代,因此招来了激烈反应,主要是来自左翼。“反法西斯阵线”的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在《南方信使报》上发表了批评意见。弗朗茨·基希海默(Franz Kirchheimer)博士是联邦州特派员,在康斯坦茨负责清算工作。他要求,对所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都要采取毫不留情的措施。“整肃措施决不能仅仅针对狂热分子与教条主义者,广大追随者也必须包括在内,因为一旦德国获胜,这些人就会成为爪牙与刽子手。党的集体罪责必须由其成员来偿还。不能拿那些被整肃的党员的未来命运来诋毁清算工作的成果。当前的主题就是赎罪!”^②

《南方信使报》的合伙人之一埃克纳,在1945年10月19日发表了《公开信》^③,尖锐地回击了左翼清算委员基希海默的言论。“复仇的旋律已经在我们的耳边萦绕很久了,现在我们希望重新听到富有人性的和解旋律。但是,现在有些人是如此执着于追究全体党员的责任,我们认为,这些人自己的精神实质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将其概括为‘我们必须给大众一些值得仇恨的东西。’所有纳粹精神的代表人物都得消失,或许担任地方领导及其以上职务的全体人员都必须离开。至于那些只拥有一枚党徽的人,我们应当放过,并把基督之爱的衣袍披在他们的褐色衬衫之上。”

现在,来自左翼的愤怒暴风骤雨般地降临了。愤怒的“反法西斯阵线”把《南方信使报》称为“纳粹同情者的秘密巢穴”,而且发行人和编辑部公开表态支持埃克纳博士。他们在刊登《公开信》的同期《南方信使报》上发表了编辑评论。“人们本应期待公职人员保持客观与必要的清醒态度,而不是满怀负面的激情。清算措施的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但基希海默博士所主张的不是民主,而是基于恐怖主义立场的专制精神。这与第三帝国的手段没有什么两样。”

愤怒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向《南方信使报》,但也有许多赞同的声音。今天看来,我们或许可以说,这场公开争论第一次彰显了战后德国正在发展的民主情绪。

但是,有一封信极大地威胁了《南方信使报》的独立性。“反法西斯阵线”的主席团成员罗伯特·温泽(Robert Winzer)博士于1945年10月20日致信康斯坦茨的法国军政府安全官佩尔蒂埃(Pelletier)上尉^④,称埃克纳的信危害了公共安全与占领军的安全,还说埃克纳对纳粹侵略战争的支持是出了名的;再说,一份德国报纸就不该“讨论军政府下令执行的政策”。

佩尔蒂埃上尉将这封告密信(温泽出于特别的考虑没有寄给费伯)转给了审查官厄尔哈德(Ehrhard)。巴登巴登与巴黎也知道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法国驻德高级统帅与驻康斯坦茨的审查官都受到了来自巴黎的训斥,但暂时尚未有对《南方信使报》采取措施的征兆。

① Fritz Harzendorf, Die Reinigung, in: *Südkurier*, 1. Jg., Nr. 7, 28. September 1945.

② Franz Kirchheimer, in: *Südkurier*, 1. Jg., Nr. 13, 16. Oktober 1945.

③ Hugo Eckener, Offener Brief, in: *Südkurier*, 1. Jg., Nr. 14, 19. Oktober 1945.

④ 转引自 Sebastian Dix, *Südkurier 1945 - 1952. Bewegte Anfangsjahre einer Regionalzeitung*, Konstanz 1995, 65 - 66.

各个政党的反应

《南方信使报》引起了“反法西斯阵线”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把《南方信使报》诬蔑为极端反动的窝点,同时指责《南方信使报》不给左派记者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这显然是诽谤。基希海默与其他人本来就可以在《南方信使报》上发表文章,但他们想控制整个报纸。如今他们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共产党于1945年10月在巴黎参加了人民阵线政府,从而使在德国的法国军政府内部力量关系变得比较有利于他们。康斯坦茨的军政府负责人弗朗索瓦·德·阿洛泽(Francois d'Alauzier)被共产党人马塞尔·第格里阿姆(Marcel Degliame)取代。“他们可以在《南方信使报》上发表意见”,费伯强调“但在共产党人加入政府以后,他们觉得这还不够。他们认为报纸只能由不同政党的代表组成的政治集体来领导,而韦尔做不到这一点。这些人说他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所以他必须走开!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留给韦尔及其合伙人与编辑部的时间只剩下几个星期了。他们的工作是杰出的。他们创办的报纸跨越地区,备受瞩目。他们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崛起之路的文章^①,这在德国是首创性的。他们报道了德国针对希特勒政权的抵抗运动^②,并且为7月20日事件的受难者筹集了援助基金。^③他们发表了《德国人的控诉》。1946年1月30日,《德国人的控诉》发表四个星期之后,韦尔及其工作人员接到了撤销《南方信使报》经营许可与解散出版社的命令。^④“所以他必须走开!事情大致就是这样。然后就成立了一个由一名共产党人、一名社民党人、一名基督教民主党人以及一名自由党人组成的领导集体”,今天的费伯如是说。借助军政府的命令,各政党得以瓜分他们的战利品。以《德国人的控诉》为起始的“自我净化”行动没能继续下去。

(作者吴福钢 德国自由记者;译者陈琛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Fritz Harzendorf, *So kam es. Der Deutsche Irrweg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Konstanz 1946.

^② N. N., *Der 20. Juli 1944.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Widerstandsbewegung. Mit einem Nachwort von Dr. Fritz Harzendorf. Schriftenreihe des Südkurier*, Nr. 1, Konstanz 1945. 这本小册子总共印刷了40万份,其销售收入被用来建立了“7月20日事件受难者遗属援助基金”。

^③ 参见 N. N., *Handeln! Nicht reden. Der Hilfsfond des Südkurier für die Hinterbliebenen der Männer des 20. Juli*, in: *Südkurier*, 1. Jg., Nr. 44, 1. Februar 1946. 援助基金的领导由 Julius Leber 的遗孀 Annedore Leber 接任。

^④ 命令最初是口头下达的。1946年2月7日韦尔接到第格里阿姆的信,信中规定(没有说明理由):1. 改组运营公司:现存公司“南方信使报出版社”解散……报纸由共产党、社民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代表组成的领导集体接管……埃克纳、克里斯蒂亚尼与迪兹先生不得加入新公司。2. 改组编委会:韦尔先生不再是报纸的一员,既不是负责人,也不是编辑……

在各政党于1947—1948年间获准创办自己的机关报之后,韦尔在1948年12月31日收到军政府来信,信中宣布1946年1月的决定无效。韦尔被重新任命为发行人,并再度成立了南方信使报出版公司。